

本书对生成语法的理论原则主要是通过具体的研究成果来体现的，所以书中并不专门讨论理论原则本身，而更多侧重于实际语法现象的研究。但毕竟了解生成语法的理论是研究具体问题的基础，因此读者如果在参


生成语法理论 与汉语语法研究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与讨论本书各个语法专题内容的同时，首先也能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关于生成语法的理论知识，包括知道其中使用的一些术语和概念是怎么回事，将更有助于我们对书中所讨论的问题的交流和讨

沈阳
何元建
顾阳 著

话，至少容易明白为什么不那样说，而要这样说，或者为什么不用另一种方法，而要用这一种方法。当然这并不是要求大家都一定事先就接受这种理论，也不是说我们已经认定只有用这种理论才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沈阳,何元建,顾阳著.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12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戴昭铭主编)

ISBN 7-5316-3780-4

I. 生… II. ①沈…②何…③顾… III. ①转换—生成语法—研究②汉语—语法—研究 IV. H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0749号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

SHENGCHENG YUFA LILUN YU HANYU YUFA YANJIU

沈阳 何元建 顾阳 著

丛书责任编辑:徐德林 张天栋 李 彤 张玉娟
王爱琳 张佳莉 杨雪松 张玉红

技术编辑:王秀艳

封面设计:张建设 伊延波

责任校对:翟文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印张23.25·字数533千

2001年7月第1版·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316-3780-4/H·30 定价:36.00元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顾 问：季羨林 裘锡圭

名誉主编：胡裕树 吕冀平

编 委 会：（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 晓 明 李 先 耕 李 彤

吴 国 忠 邹 韶 华 戴 昭 铭

主 编：戴昭铭

总 序

进入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推动了学术发展,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语言学科也不例外。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作为人类知识最重要的负载形式和传播手段,在国家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语言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乃至技术科学(尤其是计算机技术)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语言研究的新进展得力于知识更新。语言研究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思潮、新理论、新流派、新方法刷新了汉语研究的传统观念,拓宽了汉语研究的固有领域,促进了新一代学人的成长,推动了一批批新成果的成熟。为了从一个侧面反映这一时期语言研究的成果,我们编成了这套《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

学术研究最忌陈陈相因,本丛书的特点突出一个“新”字。但是,求新并不是标新立异。本丛书在求新的同时,力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新思维”的“新”,主要包括以下含义:1. 新观念,指对传统研究课题通过刷新理论或变换角度进行研究而获得的新认

识;2. 新领域,指把汉语研究同其他人文学科或技术学科的研究相结合,通过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而扩大的语言研究领域;3. 新材料,包括对新发掘的历史资料或新搜集的语言事实整理研究的成果;4. 新方法,指对有同国际语言学接轨意义的研究方法的尝试使用。我们力求使这套丛书在总体上具有实而不平、新而不奇的特色,而对各分册则要求能自成一家言,至于分册之间在流派和方法上不强求一致。

我们希望有兴趣的读者在读了各自需要的任何一分册后都有所收获,不致失望。但效果究竟如何,尚需实践检验。限于水平,疏误在所难免,敬希方家不吝赐正。

《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编委会

2001年6月

序 (一)

今年年初,沈阳就跟我谈到将应“语言研究新思维丛书”编委会之约,要与何元建、顾阳二位合作撰写一本尝试运用乔姆斯基(N. Chomsky)生成语法的理论原则来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的书。我对乔氏的理论不能说一点都不了解,但确实只是一知半解;但就从这一知半解中,我确实觉得乔氏理论中有不少合理的成分,值得我们吸取、消化,并值得试着运用到汉语语法研究中来。过去境内外已有一些学者试着这样做了。且不说汤廷池、黄正德、徐烈炯等这样一些知名学者,就是沈阳本人也曾运用乔氏“管约论(GB理论)”里的“空范畴(empty category)理论”对现代汉语里40余类由动词形成的句法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解释了不少过去汉语语法学界众说纷纭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中有些分析,如在动补结构的分析上,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见解;而何元建、顾阳二位这几年来也一直致力于运用乔氏理论原则来分析、解释现代汉语里的一些语法现象,他们的研究成果引起了汉语语法学界的注目。因此,沈阳把他们三人合作写书的想法跟我一谈,我立即表示支持。

本书共分四编：“结构理论与汉语结构分析”、“移位理论与汉语移位分析”、“论元理论与汉语论元分析”、“指称理论与汉语所指分析”。这“结构理论”、“移位理论”、“论元理论”、“指称理论”四部分虽不能说涵盖了生成语法理论，但可以说是生成语法理论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没有能力对本书上述四个部分作全面具体的评论，我只想这么一点，从全书内容看，他们运用生成语法理论原则来处理汉语事实是有收获的，特别是在打通句法形式与语义解释之间对应联系的瓶颈方面获得了一些进展。但即使只是“一些进展”，意义也是重大的。我们知道，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是一个以信息科学为龙头的高科技迅速发展的信息时代，而中国信息科学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有赖于语言学，特别是汉语研究成果的支撑。当前中文信息处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让计算机既能理解现代汉语里一个句子的意义，又能生成符合现代汉语规则的句子。要解决这个重大问题，从语言学，特别是从现代汉语研究的角度说，需要解决好怎么为中文信息处理建立起精密化、形式化、可计算的汉语语义解释规则。而本书，我认为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按我的体会，生成语法理论跟以往的语法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以往的语法理论以发现、总结、描写某个具体语言的语法规律为主；生成语法理论则并不着眼于对某个具体语言的分析、描写与说明，而是着眼于从各个具体语言中寻求人类语言的共性，以便从中探索人的语言获得机制，探索人的认知机制。而着力寻求人类语言的共性，探索人的语言获得机制和人的认知机制，这对更好地发现具体语言的特点，指导具体语言的深入研究，也是有好处的。生成语法理论的“原则与参数”说，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我不是说生成语法的具体理论原则都是合理的，而是说他的这种研

究思路是值得肯定的,是值得借鉴的。因为这将促使我们更自觉地从语言共性的角度来观察、分析、研究汉语,由此去深刻认识与理解汉语中哪些是真正属于汉语的特点,哪些则表面看来是汉语的特点其实是人类语言的共性。譬如沈、何、顾三位书中所谈到的“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名词短语分裂移位与分裂性话题结构”等,我觉得就都很值得玩味。举例来说,我们常常说,下面两个句子都是主谓句:

- (1)我吃了。
(2)那苹果吃了。

所不同的是前者主语是施事,后者主语是受事。过去我们也总是把下面的句子都看作是汉语句法中的不同句式:

- (3)他吃了那苹果。
(4)那苹果他吃了。
(5)那苹果吃了。(即上面所举的例(2))

而且认为例(4)、(5)都是汉语中特有的句式;例(4)被分析为主谓谓语句,认为“这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例(5)被分析为受事主语句,认为是现代汉语里的无标记被动句,“受事主语句就是被动句,这也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现在沈、何、顾三位认为,上面这几个句子实际都属于由动词“吃”形成的同一个句位的不同变体,其中例(3)是“吃”的典型句位,其余的都是由于名词移位情况的不同、句中空语类情况的不同而造成的不同变体。这个看法值得我们思考。拿例(5)“那苹果吃了”来说,这种结构在什么情况下才出现?

冷静地想想,它只在句子平面上出现,而在词组或者说短语平面上是不出现的。试以“的”字结构为例,现代汉语中有“他吃的”或“吃那苹果的”这样一种能起独立指代作用的“的”字结构,但绝对没有“*那苹果吃的”这样的“的”字结构(在现代汉语里有“那苹果吃的”这样的说法,但不能看作“的”字结构,只能分析为主谓结构)。在实际语言里,有时也能见到类似“*那苹果吃的”这样的“的”字结构,如“芯儿蛀了的”,不过它指代的不是动词“蛀”的施事(即“芯儿蛀了的”不会用来指代“蛀”的施事蛀虫、虫子什么的),而是指代“芯儿”的领事(即“芯儿蛀了的”只能用来指代诸如桃子、玉米等)。所以“芯儿蛀了的”表面看跟“*那苹果吃的”格式一样,其实是不同的。这就很值得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汉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形态标志和形态变化,所以在句子平面上名词的移位,哪些是真正属于句法的移位,哪些是属于语用的移位?如果我们能顺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并进行深入的研究,或许能使我们对现代汉语语法获得一系列新的认识。说“受事+动词”这种格式只在句子平面上出现,那是我的看法,不是沈、何、顾三位在书中说的。他们在书中倒另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服装设计师”、“文件存放柜”、“交通指挥灯”都是由于其中的动词论元“服装”、“文件”、“交通”移位变化造成的,并认为这样处理“反映了词库和句法的界面特征”。他们是想把论元结构理论从句法层面扩展到词汇层面,想解释更多的单靠句法规则不能处理的现象。他们的用心是好的,但在在我看来没有从系统性上来考虑问题。关于这一点不便在这里展开讨论,以后有机会再谈。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沈、何、顾三位在书中的尝试是有益的;而且他们的成功尝试也说明,乔姆斯基的理论原则是值得借鉴的。其实,把例(1)~(5)看作同一句位的不同变体,这种思想在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和《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中,或者更早一些,在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中都已隐含着。吕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里就把叙述句的基本格局定为:“起词-动词-止词”,而将“起词-止词-动词”、“止词-起词-动词”、“把”字式、被动式等都看作是“变式”(第三章)。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书中吕先生进一步说,“不但是宾语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主语也可以分别为施事、受事、当事、工具等等”,“似乎不妨说,主语只是几个宾语之中提出来放在主题位置上的一个。好比一个委员会里几个委员各有职务,开会的时候可以轮流当主席,不过当主席的次数有人多有人少,有人老轮不上罢了。可以说,凡是动词谓语句里的主语都具有这样的二重性”(83节)。可惜的是,老一辈语言学家的这些思想没能从理论上加以升华,形成更为明确的理论原则,而到现在是通过对外国的理论原则的借鉴才开始形成有关汉语语法的新的论述。

这里也涉及到在语言研究中,具体说在汉语研究中,怎么处理与解决好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这是语言研究(包括汉语研究在内)日趋深入的过程中研究者所无法回避也无需回避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妥善处理与解决,是“自然语言理解与处理”和“对外语言教学”所迫切需要的。在汉语研究中怎么处理与解决好语言共性和个性的关系问题,这在汉语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事。不过这里我不能不指出,目前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有人有意无意地把赞同“普世语法观”跟政治联系起来,这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讨论。我相信,经过了“文革”磨难的汉语语言学界的广大学者都不会赞成在学术讨论中采取那样的文风与学风。

朱德熙先生在生前就提倡学术上要树立多元论的思想。常常有人把朱德熙先生看作是中国语言学界描写语言学或者说美国结

构主义语言学的代表人物,其实朱先生并不拘泥于描写语言学的理论方法。下列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 20世纪70年代末,是朱德熙先生首先把配价语法思想引入语法研究,并建立了令人叹服的“VP+的”这种“的”字结构的歧义指数公式;

2. 20世纪80年代初,是朱德熙先生一再强调形式与意义要互相结合、互相渗透、互相验证;

3. 几乎与南方胡裕树先生他们同时,朱先生明确提出“进行语法分析,一定要分清结构、语义和表达这三个平面”这样的语法研究思路(《语法答问》37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4. 又是朱德熙先生首先明确提出应将横向的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研究、纵向的古今汉语之间的比较研究与对标准语的研究相结合的理论方法。

今天的学术环境跟20世纪80年代前不一样了。现在,科学研究领域里需坚持多元论,这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其实,多元论这种思想早已有之。当年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口号中就包含了这种思想。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多元论,说来道理也很简单,那就是:

第一,科学上的任何理论、方法都有它一定的合理性,也都有它一定的局限性。合理性 \neq 完全正确,局限性 \neq 错误。

第二,如果只满足于用一种理论、一种方法来处理、研究现代汉语(不管是语音、语法还是词汇、语义等),必定会有很大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使现代汉语研究不断深入,不断发展。

第三,学习、吸收多种理论、多种方法,有利于我们开阔思路,也好让我们少走冤枉路,更能使我们培养起一种创造性思维。

不过,真要在学术界坚持多元论,也并不那么容易。惟我独是

的门户之见,很妨碍我们博采众长。科学要发展,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基础,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的发展都是后人在前人的基础上添砖加瓦的结果。而前人的基础并不只是留下失败的教训。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受到这样那样的制约与限制,不可能一步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研究有点儿像瞎子摸象,不可能把客观事物都一下子看全了,看准了,都一下子认识透了。本书在运用乔氏的生成语法理论原则来观察分析汉语事实方面,到底做得怎么样,我看读者会给以公正的评说。是为序。

陆俭明

2000年6月,于北大中美园寓所

序 (二)

沈阳从新加坡大学来信,邀请我为何元建、顾阳和他三个合著的《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一书写一篇序。他还具体建议我撇开书的内容,说些自己想说的话,“就生成语法研究方方面面的问题做个阶段评述和小结”。

我已经十多年没写这类文章了。自从1987年应许国璋先生之邀为《外语教学与研究》写了“生成语法三十年”(《外语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4期)以后,再也没有写过。在国外,语言学家实际上不屑写语言学史之类的文章。生成语法学史方面著述最丰硕的首推 Newmeyer。四年前他把自己的生成语法史著作汇编成 *Generative Linguistics* (Frederick J. Newmeyer, 1996, Routledge, London)。序言中说到语言学家写这类文章犯大忌,人家会认为作者你理论功底浅薄,研究著作写不出只好封笔改行写语言学史。而他本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好像中国语言学界没有这种偏见,介绍、综述的文章和著作既有发表阵地又有读者市场。

中国介绍 Chomsky 的转换生成语法的文章最早见于1963年,

但此后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转换生成语法销声匿迹十多年后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才有人重提。这时国际上生成语法早已成了语言学的主流,任何地方的语言学界都不能充耳不闻。但当时要在中国介绍生成语法还是很困难的。其中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也有 Chomsky 理论和著作自身的原因。那时有些搞西方哲学的人士给 Chomsky 语言哲学硬扣了一顶“唯心主义”的帽子。这些人对 Chomsky 的著作要不是根本没有读过,就是完全没有读懂,把他的观点曲解到颠倒黑白的程度。这类无中生有的评论居然还在大学的外国哲学课本中刊出。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建议他们要先看懂再批评,后来我又写过一篇文章叫《中国人看乔姆斯基的语言哲学》(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编《逻辑思想与语言哲学》,台湾学生书局,1997 年)再次澄清一些误解。除这类障碍以外,要当时的中国语言学界读 Chomsky 的著作也确实不容易。绝大多数人认为语言学应该研究语言有没有阶级性,语言是基础还是上层建筑之类的问题,要不就以为语言研究是一种文化研究,不知道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把语言学当作自然科学或者当作数学、逻辑学来研究。

Chomsky 不同于 Bloomfield,他并没有一部公认的代表作。Chomsky 的观点不断发展,著作总量比 Bloomfield 大得多。中国语言学界看不懂他的著作不仅因为这些著作都是用英语写的,生成语法学的技术性著作即使译成了汉语,没有学过生成语法的读者仍然看不懂。在刊物上用几千字篇幅摘译或者介绍都不可能达到理想效果。为此我写了一本三十万字的《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 年),总算能够从从容容地介绍。后来有不少同行和学生说看了这本书才把生成语法看懂了,这对作者是很大的鼓励。现在回过头来看,书中还有不少问题,最遗憾的是编辑不

肯刊出我辛辛苦苦做成的索引,大概当年国内出版社的编辑还不知道学术著作是不能没有索引的。现在来看这本书有些过时了,出版时还没有“原则与参数理论”,更没有“最简方案”。后来有了宋国明写的《句法理论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等书介绍更新的生成语法理论。

研究生成语法不能停留在介绍和翻译,更重要的是用来解决实际问题,包括汉语中的具体问题,进而进一步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起大批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各大学语言学系深造,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学的是生成语法或类似的形式语法。近二十年来仅是博士论文就写了几十篇,其中大多数研究都以汉语语料为主。在生成语法的“旗舰”刊物 *Linguistic Inquiry* 上也有不少中国学者发表了论文,如徐烈炯(1986),包智明(1990),李亚非(1990,1997),端木三(1994),王承祚(1996)等,还有来自台湾的中国学者如黄正德(1987),李艳卉(1989,1993,1998),宋丽梅(1990,1994)等。在其他重要的生成语法刊物如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上发表过论文的也有多人。有些外国学者也写了不少研究汉语语法的论文,例如 Peter Cole, Tom Ernst。汉语生成语法研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可是在国内研究生成语法的气候没有很快形成。国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当然是用英语写的,虽然用的是汉语材料,试图解决的是汉语中的问题,但文章作者几乎都是外语系出身的,不是中文系毕业的,而且作者几乎都住在国外。由于这些局限性,中国学者在海外发表的研究汉语问题的生成语法论文,对国内以中文系学者为主的语言学界影响仍然有限。为了方便国内读者,我们在香港三所大学任教的四位同事合写了《共性与个性:汉语语言学中的争议》一书(徐烈炯主编,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年),评述生成语法学界在汉语句法学、语义学和音系学方面引起

争论的十二个问题。希望让国内的读者了解国外刊物上发表的著作在讲些什么。

以上情况近年来有所改善,《国外语言学》(已改名为《当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等国内学术刊物也刊出了一些生成语法论文。《现代外语》自从1997年改版以来生成语法论文的比例更高。连《中国语文》等汉语界的刊物也发表了个别生成语法文章。这类文章有两大稿源:有一类作者在国外大学取得语言学博士学位后在欧美和香港各大学任教,他们都十分关心国内生成语法的发展,尽力促进海内外学术交流。另一类作者是年轻一代的研究生,还有个别自学成才掌握了生成语法的青年学者。但这些作者也几乎都来自外语系,像沈阳那样来自中文系而有志于生成语法研究的仍为数极少。这是为什么?我并不认为语言是主要障碍,年轻一代中文系学生英语阅读能力强的不乏其人。这可能有好几方面的原因,下面我只谈其中两个方面。

原因之一是中国的系科建制不利于提供生成语法生长的土壤。由于传统上语言学(不仅是汉语语言学)一般隶属于语言文学系,而语言文学系属人文学科,学生的思维不易跳出人文学的框框。在当前信息时代,语言的应用主要在于传达信息,而文科学生头脑中总还是认为语言反映传统民族文化。我并不是说不能结合文学、文化来研究语言,但这不是当代主流,更不能替代主流语言学。语言研究向逻辑、符号、信息、心理、生物等方面靠拢是当代不可否认也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著名的欧美大学都有独立的语言学系,国外大学的语言学系一般也是从英语系或者人类学系独立出来的,也还隶属于人文学院。但是他们采用学分制,鼓励甚至规定学生广泛选课。文科学生多半修过经验科学、科学哲学之类课程,因此容易接受非人文传统的语言科学研究思想和方法。中

国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整个知识界对现代语言学的性质有进一步的认识。

另一个原因是二十年来汉语生成语法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妨碍了自身发展与推广。生成语法要在国内打开局面,最好要让大家看到用生成语法的理论能够处理并且解决一些汉语中确实存在的重要问题。而生成语法的要旨却是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现在大家在说的一些共性都是在观察欧洲语言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一研究策略本无可非议,因为总不可能把数千种人类语言都考察一遍才下结论。可是基于欧洲语言研究出来的共性在汉语中可能无所表现。面临这一困境怎么办?写生成语法文章的人喜欢用的一个办法是对读者说:这些共性其实在汉语中也存在,但是存在于更为抽象的层次上,所以不易察觉。如果能够证明确是如此当然很好,可是实际上在证明的过程中有时用了一些片面的甚至是不正确的语言材料,这就难免让人怀疑了。懂生成语法规理论但不懂汉语的人不会发现问题;但懂汉语的人不论是否也懂生成语法规理论就迟早会发现有问题。其实发现有问题并不要紧,甚至推翻一条共性假设也是科学研究过程中常有的事。然而有些文章的作者一味强辩,这就不好了。打个比方,假定外国的兔子都是白的,由此初步概括:凡兔子都是白的。一旦发现中国有灰兔子怎么办?有人说:这些兔子在更深的层次上也是白的,只是表面颜色深了。有人又说:灰的就不叫兔子,借用澳洲一种灰色小动物的名称叫做负鼠好了,所以兔子还都是白的。研究科学的人用这类办法来为错误狡辩,他的理论永远不能证伪,但恐怕不能指望有很多人真正相信。

生成语法充其量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说明人的语言能力,不可能涉及所有的语言现象,无论在行内的人还是在行外的人都不能